

一九三九年

一個革命的女性

寧謨·韋爾斯著
文化出版社印行

中國革命婦女的導師——蔡暢

蔡暢是得以參加中國共產黨內部領導組織的幾個女人中的一個，一九二八年被派往第三國際的一個代表。自從他的嫂嫂向警予（即蔡和森之妻）一九二八年（在武漢被殺）去世之後，她就是中國最前導的女共產黨員，而且從大革命時期到現在，她始終是一個最活動的女革命者。在蘇維埃首都里，她的意見是很受人重視。現在正負着重大責任，須要極大的精審和才能的工作。

當我遇到她時，她恰好剛從甘肅回至延安；她原是負責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秘密組織工作的；但我離開延安時她已被任為陝甘甯邊區政府的婦女部長，負責邊區婦女運動的全責了。

蔡暢是中國共產黨現存最老黨員中的一個，一九二三年，她加入巴黎的支部，與周恩來，李立三和她的哥哥蔡和森等一道工作，在巴黎和莫斯科研讀之後，她回國來，做了一個國民黨的領導份子，北伐時期第一個被派在國民黨總政治部中工作的女性就是她，當時她只有二十六歲，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分裂之後，蔡暢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里從事地下工作，這時候，一點點兒的錯失

就會招來逮捕與死刑的。

當我到達延安時。蔡暢立刻來看我，一見到她，這三十七歲的老革命戰士的神采，使我大吃一驚。她身體不大，外貌閑雅整潔，極富於女性風度，也許她說得一口輕軟而又含糊的法語，而大大加強也說不定；她的臉龐很不平常，是一個瓜子臉，高的顴骨，尖的下巴，還有嫵媚的微笑和康健的牙齒，這臉相在她年青時一定是漂亮的，現在已有一條條的綉紋了。我們可以從她那溫柔嫵靜的態度中，看出她是一個有獨特的個性和巨大的決心的婦女。

我立刻就喜歡她。

談話一開始，我馬上發覺她是一個十分仁藹熱情的人，雖然同時又是一個冷靜的負有秘密使命，時時需要極端鎮定的「黨的工作者」。在那些把各自的身世告訴我的人中，事實上，只有劉群先和她兩人動過感情，當蔡暢把一九二七年的悲劇和她兄嫂被殺等告訴我時，事情雖然遠隔十年，但她好幾次竟垂失聲。這種強自壓制的情感使我非常感動，連我亦跟了她哭起來。

蔡暢到現在還是崇拜她的母親，這可異的老婦，到了五十歲才進小學，並影響她的孩子們後來成爲共產主義者。蔡暢把在長征時當寶貝一樣的携帶的那

一張相片給我看，這老婦人強健的臉龐充滿着堅決的神氣，像蔡暢自己的一樣。

當我看到十五年來中國殘酷的革命生活，並沒有毀壞這個婦女，使他變得冷酷時，我們實在感到驚異，他在心理上是非常健康的，他對敵人的態度是嚴峻的，但絕非變態的，經過了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他怎麼沒有變為一個對生死毫無感覺的旁觀者，我實在不明白，事實上，他是這樣的富於人性，富於情感，又這麼的和善親切，就跟世上一切慈誨的人們完全一樣，比如，有一樁事情很可以看出他這一特點：我在延安時，他好幾次送鮮花給我，鮮花在延安是非常珍貴的，這舉動要不是對別人親切和寬愛，便沒有旁的理由。

我聽說過，中國婦女之所以成為最優秀的女革命者，全因為她能耐苦（歐美婦女的少能做到這一點），但在我看來，這倒是因為他們缺少感情，對於痛苦景象不能熟視無睹的緣故，不過他，是這樣的人，我覺得，世上再沒有一個國家能產生一個比他更優秀的女革命家和他更爲優美的個性。

蔡暢生於中國一個著名的革命家族（不過這家族跟曾國藩有着親戚關係）他的哥哥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初時跟毛澤東一起，其後在巴黎時，與周

恩來，李立三一同工作，最後，則領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蔡在一九三一被處死刑），她的嫂嫂、即被人稱爲「中國革命之母」的向警予，亦是著名的共產黨員，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在一九二八年被殺。蔡暢非常敬佩向警予，當她把她的身世告訴我時，我感覺到，好像別人在向我述說蔡暢的故事似的，因爲向警予個人的經歷跟蔡暢的很有相似。

蔡暢同族的革命者，現在活着的而自由的，只有她一人。其餘有三個被殺。兩個現在還在獄牢中，由我看來蔡暢提及的每一個親戚，差不多全部被殺，我不曉得她能跟國民黨×將軍和何健等合作這問題，當她把各事都敘述完了之後，我就提出來問她：

『要叫你個人的感情跟這合作調和，究竟在你心理上是不是萬分的困難？』她稍爲沉思一下回答着說：

『不錯，我是一個感情的人，那些事情我也不能忘記，但我能够在我們民族利益中竭力忘却我個人的悲苦。我們中國人當前的危機是太大了。所以我個人的事件是毫不輕重的事情。』

『在革命的過程中，殘酷是不能免的，個人不幸的遭遇亦是不能免的，眼

徐海東全家七十餘人在湖北被殺的事情比起來，我自己個人的損失還是很細小的。」

以下就是蔡暢告訴我的故事：

「一九〇〇年我生於湖北的湘鄉。我家原是個小地主，但到我出生之時，牠早就破產了。父親是上海國立兵工廠（這是清末年設的）的職員，他們未贖養他在湖南的家庭。未曾送過他的一個子弟上學校。我是頂小的，上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姊姊。母親爲使我們能够上學，不得不變賣她的裝奩，她是湖南官家出身，父親是曾國藩的親眷，我的祖父，在圍剿大平天國時，當過曾國藩的麾下大隊隊長。」

「當我年幼的時候，生活是很困苦的，因爲我父親是一個頂壞的壞人，一點也不照顧家庭，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們全都恨他。我的母親在那時候，真是一個可驚的人，當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爆發的時候，她已經過了五十歲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響，決定不謹是她的孩子們，連她自己都受教育。她把衣服，銀器，金針等裝奩變賣，換了一點錢，因此我們四個人就能够進一年學校。當那入學的费用非常省，膳宿費全免，只要一小筆書籍費就行。我的哥哥蔡和森和母

親進了高級小學。我却進初級的，姊姊蔡真瑞（譯音）則進針黹班。過了這一年之後。我們的錢已經化光了。那時大姊三十歲是個寡婦，撫養親生的一個女孩，她結婚時，我家裏還沒有破產，所以她還有些裝奩。因為他很不滿意他的夫家，因此、願夫家如何。他把他的裝奩變賣了，供給我們繼續上學。

『我的母親和我的兩個姊姊全都纏足，但我却没有纏過，因為在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這風俗已改變了。我的母親入學兩年之後，在高級小學畢業了，就回到我們鄉裏來，自己開一所學校，雖然是當了校長，但除自己的膳宿之外，他不拿報酬，因此我們又沒有錢繼續入學。我改進我母親的學校，哥哥却在家自修，我哥哥非常聰明好學，他可以關在房裏一點飯也不吃的唸一兩天的書，因此不久便考進了師範學校。』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從上海回來，他反對自己老婆和女孩入學，他要把我賣給一個地主當媳婦，那地主願意出五百塊錢，但母親却劇烈的反對，因為他自己受過她的公婆的虐待，他的大女兒在夫家一樣的受到殘酷的待遇，所以決計不再干涉我的婚姻。讓我自己決定，他幫我逃到長沙，讓我從那里的親戚家借一些錢度日，不久我就進了周南學校的體音科。——當我在初小時，就

非常喜歡音樂和體操。能够奏風琴，和唱歌，亦能够唸譜。

「這學校的程度和中學相同，普通的學程，是四年初小，四年高小和三年師範。我是一個好學生，能够跳過許多級，只過了二年半就唸完了。我獨自一人到長沙進學時，只有十一歲或十二歲光景，但我已能像我母親一樣，用功唸書唸到午夜。我在中學裏的成績非常優秀，所以畢了業後，他們要我到周南附設的小學裏教課，我在那裡教育四年體育和音樂。

「同時我哥哥蔡和森（他比我大五歲）亦進了長沙的第一師範，他在那裡跟毛澤東做了好朋友，到了一九一八年，當我哥哥進了高級師範學校時，我們已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了，雖然「五四」運動正要過一些時才爆發。他和毛澤東兩人組織了「新民研究會」哥哥和我是好朋友，因此我是一個唯一准許入會的女性，我的哥哥跟我不大談政治問題但是我從傾聽談話和參加會內的活動中，却學會了許許多多。我非常欽佩我的哥哥和毛澤東，並且希望能同他們一道入學研究，但我不能不賺錢幫家，所以只能繼續的教下去。毛澤東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學生，才學見解都很卓絕，就在家時，他的思想已經很進步了。新民研究會研究着各種學校課程外的東西，並且建立他自己的理想，那時候我們已經同情

於無產階級了。

「我的社會背景是破落的封建地主階級，雖我不曾當過像我和母親我大姊一樣的生活。我的母親生於書香人家，但我的祖父沒有致中秀才，後來在曾國藩麾下任職。我的父親是個商人和地主，我的曾祖父是個商人，積蓄了許多錢置下了田產。後來把這些田產分給三兄弟，每個兄弟得了六十畝我的父親就繼承了這些。但我的祖宗們，從未下田工作過。」

「我的母親，哥哥和姊姊們如此熱心求學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得不借此來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因為我們除了教書之外，沒有別的謀生的辦法。另一個原因就是我的母親一向被古老封建社會所壓迫，現在她想解放出來，決心使她的子女亦能得到自由獨立。這可異的婦人今年已八十六歲，還住在湖南，父親則五年前死去，他從未給我母親一點錢，他是個鴉片鬼，另在上海討了個老婆。」

我憎惡結婚 因為我深知母親和大姊的遭遇，我又看到這個社會里，結婚的人大都過着不快樂的生活。我只想讀書不願結婚。哥哥和毛澤東也是一樣。宣言終身不娶。他們之所以能夠和我做了好朋友，這亦是一個原因。但不久之

後，我們三個人拜全拜快樂地結了婚！

「我跟母親很受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影響直到一九一七年五四運動時我的思想還沒有淨化，那時一切摩登的和進步的思想，我都喜歡，我希望活在一個光明而美好的烏托邦社會里。在五四時期，爲了日本的壓迫和二十一條件的激動，我對民族主義很感興趣。因此我一面幫助學生的組織和活動，一面也組織了教師的抗日會。

法國工學團：

五四之後，我哥哥和毛澤東到了北京，在那裏組織了「留法工學團」而同時，另一個女子向警予和我，亦在長沙組織了「婦女工作團」。

「一九二〇年，這個女子——成爲中國最優秀的女革命家——跟我的母親我哥哥，和我一道到了法國。毛澤東沒有到法國去。在十六個同時赴法的女子中向警予比任何一個都優秀得多，除此之外，有這些女人中沒有有一個人後來做過一樁重要的事情。她們全都是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跟我和向警予加入共產黨的亦是有兩個人，但不久都退出來。據我所知，有兩個現在在「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書，關於其餘的人，我今不知道。向警予呢，她成爲中國最前導的女共產黨員，一九二八年在武漢被殺。

「這是中國留法學生的一部份，他們一面做工，一面進學，因為大戰之後，法國非常需要工人，領導這一個運動的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是當時法國的吳稚暉，一个是北京大學的李石曾，李跟法國政府談判移工人和窮學生到法國做工，每人各出特定的川資百元，沒有錢的，可向法政府借，當時毛澤東和我哥哥到了北京，會晤北大教授楊昌濟（毛澤東髮妻的父親）他把他們介紹見李石曾。我們不願做無政府主義者，又都想利用這個機會到法國去念書，我才想請李代爲借錢，恐怕這會限制我們的活動。因此我們向一位富有的親戚（上海某紗廠的廠主）。借了路費在赴法途中，我們坐的是船底下的四等艙，待遇簡直和畜牲一樣。

「我們是按照這商定移到法國去的第三批。周恩來和羅逆他們是第一批，此外共產黨員在這一次到法的還有李富春——後來他是我的丈夫——李立三，趙世炎，王若飛，傅忠，郭南珍，（女譯音），何長工（工人）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喬年，陳延年。這些人中，陳延年，在一九二七年清黨時被殺，陳喬年在一九二八年被殺，郭南珍——一九三〇年，在濟南被殺，趙世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被殺。王若飛後來則成爲陳獨秀的尾巴。傅忠現在紅軍大學，李富春

是甘肅省蘇維埃的代理主席。

『一九二〇年，和我一道出國的男學生，約在一百人以上。留法的學生大部份是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出發的，由一九一九年這商定開始到一九二三年底止。（留法工學團）前三批到法的人已在一千以上。但我們的「二月示威」（說明見後）之後，中國政府就限制了工學團遣送人員的數目。自然還有許多中國學生是由政府派往法國留學的。』

『當我們初到法國時，中國學生有兩種主要的思想潮流：（一）民族主義，他們以為救中國的最好辦法就是振興實業。發展教育，使中國進化強盛，並拒抗帝國主義！而（二）是相信社會主義革命的人，社會主義派中的領導人物是我的哥哥蔡和森，和向警予和我自己。我們在法國組織了一個「新民研究會」的支會，繼續作社會問題的研究。初時我是屬於「教育救國派」的民族主義者的，但隨即就信仰社會主義綱領的正確。我們本來沒有社會主義，直接到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留法中國工學生舉行示威並包圍中國領事館之後，我們為着繼續對抗這種官僚制度，就組織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團體「勵志會」。

『引起這次「二八示威」的原因是這樣的，我們到了巴黎之後不久，我們在「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法教育會」控制之下。有些學生是無政府主義者，比對待

別的學生好得多。在我們出國之前。我們曾得到這樣的保證，我們不惟有工作的權利，而且有求學的權利，但是到法國之後，許多人都沒有讀書的權利，爲着生活他們必須不斷作工，因此我們要求使館幫我們解決這問題。當時使館是同情無政府主義者的，但我們認爲無政府主義，並不能救中國。我們對這一運動，提出了如下的三個口號：「爭取讀書的權利」「爭取吃飯的權利」「爭取自由思想的權利。」這樣示威運動是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他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七年被殺害」和我的哥哥領導的。

「示威的結果很簡單，使館用分裂學生陣營的辦法，把這糾紛緩和下來。服從命令的，允許給以津貼，而拒絕妥協的，像各個社會主義者，則只有返回工廠和學校，並且要求公寓和飯館的主人。把賬單送到使館去。最後，我們竟被迫發動我們的「十月革命」。

「吳稚暉曾經竭力誘導學生信仰無政府主義，在示威時，亦企圖排解。但給學生打了一頓。這次的示威我亦參加。後來被拘留了一天。我的母親，向警予和別的六十個女人，亦同我一樣。這些人中，後來只有六人參加社會主義派，其餘的人則站在無政府那一方面去。」

想念未死
好戲重
之極
道信
標

『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之後，全體學生分成三派：即社會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和理想的社會主義派。當時我們沒有共產黨，連社會黨亦沒有。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有二百個社員。學生中的三分之一，則為無政府主義者，但我和我的哥哥對無政府主義始終不感到興趣。社會民主派的人，後來半成為國家主義派，如李璜和曾琦，而智識份子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巴金。現在仍沒有改變，而無政府主義派的工學生，後來却大半成為社會主義者，就像曾是他們的領袖的陳延年。』一九二二年春，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但他在法國的兩個孩子，却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很反對他的父親，直到後來他們變成共產主義者時。他們之間才有友好的關係。（當時李立三亦是同情無政府主義者的。）而在這三派之中，自然還有許多學生，並沒有政治的立場，只想以實業和教育「救中國」那些受政府津貼的學生，他們的政治，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改變。我們「勵志會」中的會員，不盡是社會主義者，但加入了後，却多半馬上成為我們的同志。其餘的則屬於國民黨的。

『二八事件發生之後，政府人員，和無政府主義者，已看出他們無法控制和影響學生們了。因此吳稚暉領取了一部份庚子賠款，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

學。表面上這是用來解決留學生的半工半讀問題的，但大學成立之後牠馬上改變態度。只收容無政府主義者，和有錢的留學生，貧苦的工讀生反而不能進學。

爲着對這表示抗議，我們在一九二二年發生了我們的小小的「十月革命」當時差不多有一千多工讀生參加包圍中法大學，但是這運動因法國警察的干涉而失敗。有一百零四個領袖且被強迫送回中國。我的哥哥——他是負責領導這一示威運動的——王若飛，李林（譯音）和林衛（譯音）都在里面，周恩來本營亦率另一隊學生，由巴黎到里昂來參加示威的，但在到里昂途中，聽到有一百零四個人被捕的消息後，就拆返巴黎。

「不久之後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周恩來，陳延年，趙士炎等在法國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的支部，這巴黎支部，是歐洲第一個支部，後來巴黎總部又在柏林建立了另一個支部。於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運動都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了。

「一九二三年年頭，黨剛成立不久，我即刻加入了共產黨，同時又和李富春結婚，巴黎支部有七個發起人，但在我加入以前幾天之內，他已有三百個黨員，開始時，所有的黨員都是工讀生，但不久之後就有工人參加，當我在一九

二四年離法時，牠的五百個黨員之中，已多半是勞動者。當時黨曾猛烈攻擊，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結果被法國政府禁止活動。在我離法時，牠已被迫秘密起來。

一九二二年六月，我開始在一家電燈工廠做工，每天十小時工作可得八個法郎，夜裡我就學習法文和讀書，後來我又在別的三家工廠做工過。其中有一家是一家橡皮鞋廠，一家是印刷絲手巾工廠，工人的待遇是非常惡劣。工廠在七點鐘開工，但我們却要六點鐘到廠。以便一個個的進入工廠。在我們離廠時，每個人都被搜過。廠裡不許工人互相談話。這些工廠有許多中國工人，待遇的惡劣跟法國工人完全一樣。那些法國工人對我們非常友好。因此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

「當我在巴黎時，一萬個在大戰時到巴黎的中國工人，還住在那兒，此外還有一千六百個學生。當時在法國做工的學生共有三千人。分八組，並有一個中國織工會。這職工會，附屬於法國總工會，並分設五個分會。工讀學生全部都參加，我亦在內。工人與學生一道做工，使工人們在思想上大受學生的影響。這些工人現在有許多還在法國，共產黨員們多到莫斯科去唸書，不久之後，就回國參加大革命。現在除少數，仍跟紅軍一道外，大部分的人，都在一九二

七年被殺了。

「我是一個黨的活躍的工作者，我丈夫亦是一樣，他在一個機關，車廠作了四年工，始終沒有發膏的機會，但我在初到巴黎時，幸而還能夠進一家初級學校唸書，我是負責黨的組織部的工作的，當時黨除我之外只有四個女黨員。有兩個是湖南來的，其餘三個就是郭南珍，錢若明，和熊繼坤（譯音）後來兩個都退黨。」

「我在巴黎做了兩年工以後，一九二四年黨派我到蘇聯。我在東方大學唸了四個月書，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我便回國，我和我的丈夫李富春被派到廣州去做革命工作。我們到廣州那一天，正是廖仲凱被刺的日子，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二五年，我同時在我們黨和國民黨內工作。（我是加入國民黨的），是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一員，跟廖夫人何香凝在一道。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佔領南昌時，我被派到當地省委工作，同時又在北伐軍總政治部擔任宣傳工作的職務。當時擔任這工作的婦女只有我一個人，到了武漢時期才有別的女人參加。」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到武漢，參加共產黨婦女部，在女學生和女工中工作，同時又是國民黨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七月國共兩黨分裂，我脫離國民黨，做了一時候的秘密工作。十月便離開武漢到上海，在上海黨的省委中工作。」

一九二七年，我黨人員被殺的，現在只有一個約畧的數目。黨重要的領袖被殺者一百人，而全國婦女領袖在該年被殺者，則在一千人以上，其中不盡是共產黨員有些是資產階級婦女，許多則是學生，但他們全是革命的領袖。全國各級共產黨員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後一年內，在上海，廣州，湖南，武漢一帶被殺者在萬人以上，由四月到同年十二月，連革命者在內，被殺者則達十二萬人之多（下兩段刪。）

在這一恐怖時期，中國婦女都可以說，我們的女同志在被捕之後，全都十分堅決絲毫不動搖懺悔，這是我們中國婦女的光榮。當她們受了死刑的裁判之後，差不多全都勇敢地高喊着：「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革命萬歲！」等口號。作為她們最後的遺言。

『在七月到十月，當我在武漢從事秘密活動時，我就親身目擊過許多這樣的事情。』

『一九二八年五月，我作爲江西省代表之一被黨派往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的第六次大會。赴會的中國代表二十五人，回國之後，我在廣東和廣西做秘密工作。雖然這是非常危險的，但我從未被捕，只有幾次間直差一點兒。要是我被捕的話，只要他們看認出我，一定馬上把我判處死刑。當時我是跟女工們一道工作的。』

『在一九三一年底我進入江西蘇區，隨即在江西黨省委和婦女部中工作。』

『一九三四和三五年長征時期，我在路上負責當地的和蘇維埃政府兩方面的工作。當時我害了很重的結核病，但現在已經好得多了。一九三五年我跟毛澤東等一道到了陝西，開頭我在陝甘寧蘇維埃政府從事黨的和婦女方面的工作，稍後我就被派往甘肅負了在國民黨佔領區內從事統一戰綫組織工作之責。現在我或將被任爲此地新中央邊區政府的婦女部長。我希望我能有時間進紅軍大學或黨校研究，不過黨拒絕我的要求。』

『這就是我的「英勇的歷史」。這些，看起來大概不會是快樂的吧！是不是

？朋友和同志被殺或被判處死刑的是那樣多，甚至連我亦已記不清他們的名字。我們一家，就有兩個哥哥——一個嫂嫂因爲是革命而被殺，還有一個嫂嫂和一個姪兒，現在尚在獄中。我的另一個哥哥和一個姊姊已經死去了。我家裏所有的人全都死光，剩下來的只有我自己，母親，大姊和三個小孩——我自己的——個女孩，我哥哥嫂嫂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我的孩子跟我的母親一道在湖南，這女孩是一九二三年在巴黎養的，因爲我母親恐怕這小孩妨礙我們的讀書和工作，就帶他回來，一直撫養他到現在。）我前後一次看見我母親和小孩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上海。現在我的家庭沒有房子，沒有田地，生活全憑我姊姊做手工支持，我們其餘的人，早把革命當作我們的職業了。

「除開我丈夫——現在此地跟我一道工作，我家有六人是共產黨員。我們之所以成爲革命者，是因爲受了經濟的和社會的壓迫，但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我的可異的母親給我們的影響。到了五十歲，這驚人的婦人竟離開家門進了小學。初時，因爲她這樣老又兼纏足，學校當局拒絕收容她，但她十分氣憤，竟至跑到縣衙門控告那位校長，結果她從縣長處得到可以進學的諾言。由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她的決心是怎樣的堅強了。當她入學以後，學

校當局告訴她說，她用不着上英文課和體操課，但她唸英文反而特別用功亦一樣上體育課，雖然他纏過的雙腳，在跳高和跳遠等課程上，要鬧出許多笑話。

「當她將近六十的時候，她堅決要到法國去，她跟我們在同一個學校裏唸書，又當我們生活情形非常惡劣時，她做刺繡資助我們。她鼓勵我們加入共產黨，她本人亦很想加入，但因年齡關係被黨拒絕。當她一九二三年帶着我的女孩回中國來之後，她着手在長沙開辦一所專教貧窮女子以手工和針黹等技藝的學校，再把工藝換來的錢幫助這些窮苦的女孩子們，在那時候，她的學校和家庭成爲長沙共產黨的秘書工作的中心。」

革命的伴侶：蔡和森和向警予

我哥哥蔡和森是一個極優秀的革命家。十四歲時候，他還是一家商店的學徒。到了他能够進學的時候，他的刻苦用功，簡直出人意料之外，要是他有二個銅板，他一定一個銅板吃飯，一個銅板買書。他是一個良好的組織者，他所領導組織的團體，對中國的革命都給予極大的影響。首先，他組織了「新民研究會」，又跟毛澤東一道組織「留法工學團」。他在法國協助組織社會主義的和

共產主義的運動。回國之後他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和中央某部的負責人，後來他又是共產黨北方局的負責人。

「一九二五年，作為中國派往第三國際的代表。他到了莫斯科回國之後，即擔任兩廣省委的書記，黨機關被發現之後，他隨即被捕。一九三一年在廣州為陳濟棠所殺。就他的天才和個性上說，他非常像毛澤東，而他兩人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的另一個兄弟蔡林其（譯音）亦是共產黨員。他曾經做過店員，而在上海工廠做工以前，曾有一有時候失業過。後來他進入廣州的黃埔軍校，他還沒有畢業，省港大罷工開始，於是他領導工人的糾察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南羅（譯音）與英國所僱的基徒接仗時，被他當場殺害。」

我想，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們都會成為共產黨員的，除開我的二姊年紀很青就死了，大哥亦早在革命前死去。我的父親恰恰跟我們所有的人完全相反，他非常野蠻，有三次甚至想把我母親殺死。後來母親終於和他離了婚。我們對這個人的恨，其程度跟我們對母親的愛一樣深刻。

「我的嫂嫂向警子，我以為就是到了現在，她還是中國有數的最優秀的革

命者，而她的影响是空前的。她在一八九七生於湘西淑浦一家最大的商人家庭。她的母親和父親生了十二個小孩，警予排行第九。她有幾個兄弟跟他爸爸一道做生意，兩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則在日本唸書。直到她死了的時候，他家參加革命的，只她一個人；現在說不定已有別的人參加，但我不知道。警予是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

「她第一次進學校是在十四或十五歲的時候，後來畢業於周南女子師範。她在學校裏唸書非常用功，同時又是學校裏各種學生運動的領袖。校裏的教員學生全都愛她敬她，譬如丁玲的母親就是她的同學，警予對他影响很大。

「初時警予對古代墨子博愛的哲學非常傾心，因此學校里人家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墨子」。

「在周南畢業後，她返回故鄉。在當地組織了一個女子初級小學。自己做校長。這正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和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的時候。這位二十二歲的少女就在故鄉領導整個的五四運動，她發表無數次公開的演講，因為對工作萬分熱心，她身體簡直完全給摧殘了。她在工作的時候，時常完全忘記了自己，真不愧為一個天生的領袖。警予身材很小，姿色平常，但倒是健康的，容

來因爲在黨內工作過度，身體受損極重。

『警予是一個非常出衆的演說家，她的羣衆宣傳工作很有成績，因此人家叫她做「新傳道士」她在湖南教育界組織了一個「抗日救國會」，自己負責進行各種工作。

一九一九年，警予和我組織了一個赴法的工學團，我們倆和我的哥哥，母親同船赴法，就是那時候，警予還是勞警要過獨身生活，把整個生命貢獻給革命工作的，我們的哥哥亦是一樣。但是在海程中，他們兩個竟傾愛了起來，雖然都會拚命爭扎過，希圖保留「獨身」但最後終於在法國的蒙泰恩結婚，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這次最先動搖獨身的決心的，倒是被人稱爲「聖人」——因爲他曾發誓終身不結婚的——我的哥哥和森。

警予和我哥哥在師範學校裏是同學，我們時常一道討論各種問題。起初他們的愛是傾於靈方面的，直到後來，方才改變。他們交換詩作，後來在法國收集起來出版，題爲「一起朝上看」(Look Upward Together)這詩集現在已經遺失。

集中的詩有部份是純粹的浪漫詩，把結婚描寫爲跟理想完全和諧的精神的

戀愛，另一部份則訴說他們希望回國一起爲革命戰鬥的夢。

他們兩人在蒙泰恩進學。領導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的，就是他們兩個，但和森却因此被迫離法，這時警予身中已經懷妊，沒有即時回國。孩子是在中國生的，是一個女孩，今年十五歲，現在還在蘇聯唸書。另一個男孩現在在長沙，跟我母親一起。

「他們兩人一回到上海，就加入黨。在上海中央委員會中工作。他們兩個是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奠基人，這研究會在和森離法之後，不久就成爲共產黨。我哥哥是一九二二年入黨的，警予則在一九二三年。」

向警予和中國婦運

「警予是中國共產黨婦女部的建立人和第一任的部長。這一婦女運動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漢綫大罷工開始的。自此之後，警予迅速地把她擴展到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和河北的平津。於是婦運迅速開展了，而警予亦就夢想中國婦女的迅速的解放。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只影響知識份子與學生，但現在警予已開始組織女工和農婦了。」

「在向警予建立起中國真正的婦女運動之前，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國內已微有女權主義運動的傾向了。這一運動揭起資產階級的主張，即爲反對男性而開，從男性壓迫下爭取女性的解放，但警予却把整個運動的領導納入社會主義的河床，給予她一個新的鬥爭的方向。她認爲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低落，是原於中國社會制度的落後，因此婦女要得到解放，唯有改變整個社會機構，亦只有這樣男女兩性才能得到解放與自由。」

「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到六月十八日開始的省港大罷工這短期間中，向警予在上海，香港，廣州組織了無數的女工，結果有數千的女工加入了省港的大罷工。」

「在向警予之前，中國沒有真正的婦女運動的組織，只有幾個小規模的，非政治性的資產階級團體，如「女青年會」「婦女參政同盟」。和「節制生育會」。當時在共產黨的支部裏，在工廠裏，以及在別的團體里，男女是平等地一道工作的，但她們却有一個「婦女會」。這是公開而合法的，而赤色工會和農會則是秘密的。這婦女會在全國有十萬會員，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她們的全盛期，當時會員達三十萬，鄉村的與城市的全包括在內。」

「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後，警予和我的哥哥被黨派往莫斯科，哥哥是中國派往第三國際的代表，警予則進莫斯科的「東大」念書。

「一九二七年，他們返回漢口，一起在湖北省總工會中工作。他們是五月回國的，但同月三十一日，湖南已開始鎮壓共黨了，而到了七日，兩黨便宣告分裂。

「分裂之後，警予仍然留在武昌從事黨的秘書工作，她的丈夫則到廣州去。當時她負責長江局的宣傳部，並任秘密黨報的主編者。

「四月警予在漢口法租界被捕。因為她是一個英勇的革命黨員，又是法國的留學生，法國領事非常敬佩她，不想把她移交給中國政府，但中國當局却堅決要求引渡，因此法國領事跟他們起了爭辯，但最後她终于在四月廿九被移交了。到了五月一日，就被判處死刑。

「因為她是工人們敬愛的領袖，在羣衆中有着極大的影響，所以工人們準備來一次暴動，把她奪回。這事使國民黨提前將她處決。當公開槍決的那一天。全城頒佈戒令。一切商店全都被迫關上店門，在到刑場去的路上，亦由許多警察和憲兵嚴密地警戒着。這樣，工人們的計劃失敗了。當她在路上時，她當

衆演說和高呼口號。憲兵們兇毆她。想使她不再說話，但她仍然滔滔的講下去，因此他們在她嘴裡塞着石頭。又用皮帶縛她的雙頰。街上的許多人看了都哭泣起來。

「在我們共產黨中，我還沒有見到一個能和向警予比並的人。她的死是一個無法計算的損失。從最早期起，她就是我黨一個優秀的，勇敢的忠實的和活躍的黨員。」

「她時常拼命工作甚至忘記了飲食。她得到了每一個人的敬重，在任何時間地點，他總自然而然地是最先行動和處於領導地位的人物。就是當我跟她一起在法國時，亦是如此。」

「她是一個緘默的人物，勇敢而又負責。她是一個知識階級，喜歡思索，她能準確地估計政治的形勢。她跟群衆的關係亦很密切，爲了她對他們一切的問題極感興趣，所以她非常了解他們。她喜歡寫文章，時常在黨的刊物「吶導」上寫稿。當她被捕時，她那一本論述「中國革命問題」的書還沒有寫完，但憲兵們把這部未完的稿毀掉。此外她對古典文學亦很有研究。」

「警予是一個勇敢的革命者，但她的生性是十分仁慈的。她不僅對同志和

同學很好，就是其他的人，她也幫他們解決各種個人的問題。如果有一個女人沒有衣服，而警子只有兩件時，她必定分一件給她。她有着非常堅韌的意志，固執而且頑強，跟人爭論問題時，她的意見很難得改變，然而，她雖有着堅韌的意志，却又合理地控制着她的感情，但她畢竟是一個非常感情的人，她非常熱愛她的丈夫和兒子，同時她又願為她的革命工作而獻身。

「當我的哥哥聽到她被捕時，他正在上海。他曾竭力想盡種種方法營救她，結果全部失敗。警子死後，和轟非常傷心。而三年後，即一九三九年，他自己亦在香港被捕，而且秘密地被處決了。現在他們乘下來的，只有兩個小孩和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而已。

「在中國共產黨中，警子時常被稱為「向大姊」或「革命的媽媽」，雖然她死時只有三十歲，我們的許多同志時常想起她，她的慘死使我們心理萬痛惜。

「我家所有的革命者中，除我而外，現在倖存的只有一個姪子和一個嫂嫂，但他們此刻全都在牢獄中。目前我唯一的志願就是繼續這些和別的許多殉難了的同志們的未竟的工作，實現我們未完成的革命拯救我們的中國！」

1
4.10.14

0.10